



论“文化场”视域下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

□ 黄体锐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2)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担负有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现代大学理念在跨文化视域下具有不同内涵,整体呈现“西学东渐的局面、布迪厄“文化场”理论为高等职业院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托,可以在顶层设计、文化建设、职业精神培养等方面建设高校文化场,从而使高等职业院校在育人、治学、文化传承、引领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更大效能。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大学理念;文化建设;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54(2015)07-0057-04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逐年增长,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片面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弱化了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直接导致学生的知识技能与文化素养呈现严重脱节,出现了人才培养的功利主义倾向。因此,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建设、重塑大学精神就成为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以“习性—场域”为核心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布迪厄认为,“习性寄寓着个人教育社会化过程,浓缩了个体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文化传统,习性的展示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空间来完成的,就是场域”^①,由此推衍,就能够明确,单个社会个体文化素养与其生活的社会“场域”息息相关,场域中的“行动者”受“场域”整体氛围的影响,发生着互动式的博弈,必然产生相应的碰撞与交融。同时,布迪厄还通过分析比尔农村和贝恩亚山区社会状况进一步探讨“场域”的演进规律,他认为

“浑然一体的社会其实是有一个个社会小世界组成,这些小世界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结构上同源,遵从支配与被支配的影响。”^②梳理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我们发现其理论特质主要体现在:(1)场域是在社会体制中的一种形态构型,与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开放性而非封闭的;(2)场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的场所,学校教育体系、教会和国家不是单纯的工具机器而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权的展示载体;(3)行动者携带一定的“习性”参与场域游戏,能够形成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将会重构习性,并反映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按照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高等职业院校具有为社会培养优秀建设者和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同时还兼具有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与当下我国文化建设方略息息相关,与青年大学生价值培养紧密相连,已经具备了构筑“区域文化场”的基本要素。当前,我国进入到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多元期,准确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内涵,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建设,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应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亟需突破的重大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黄体锐(1978-),男,河南濮阳人,河南化工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

收稿日期:2015-03-16

一、“文化场”与行为习性——高等教育现代办学理念诞生与传承

(一)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的“习性”教育

根据文献记载,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我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曾记载过:“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意思说,虞舜时成立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所传授的内容是“成均之学”。“均”字即“韵”字的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成均之学”就是以乐教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这是迄今最早的关于大学定位的解释。到了夏商周时代,学校正式建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些机构都具有官办性质是政教合一的产物;汉代承继教化传统设立太学;隋唐时期设立中央官学,分为“六学二十馆”。清代学者胡渭在《大学翼真》对于大学的教授内涵有过较为详密的论述:“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③由此可见,传统大学理念是以“明道、致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思想集合体,并简笔勾勒了中国大学的精神主轴,从而在奠定了中国历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办学方向和基本功能。

(二)从洪堡到纽曼——西方大学理念的宣扬与影响

西方大学理念最早源于古希腊艺术美学。古希腊艺术美学理论提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心灵的善念,主张教育过程中应将心灵的美育作为一切的重点。欧洲中世纪时期,大学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主要指古典派知识分子进行研讨和辩论的学术性聚会,这类学术聚会所讨论的始终围绕着三大核心议题:“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④。这实际是一种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其实质是在教育中以人本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轴,将社会大语境中个体作为剖析的主要聚焦点进行阐述和挖掘。英国宗教领袖、教育家纽曼(Newsmey)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

原理、探索 and 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是启发心智的地方”^⑤,他们认为涵养人性,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思考和智慧生活是大学的唯一职责。但是,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洪堡(Humboldt)则主张大学应该提倡科技教育,大学教育应该是倡导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统一体,在注重常规教学,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由此以纽曼、洪堡为代表的双重办学观就既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大学特征,同时也揭示了西方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轨迹,为当前大学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

(三)从“西学中用”到“兼容并蓄”——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明显受到了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1898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举办京师大学堂成为近代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起点。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后借鉴西方教育理念,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这是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最早文本,《大学令》规定了大学的培养目标、学术分科和学术机构;《大学规程》则对具体的办学体制和内设机构作了规定,两个文本既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体系成形的标志。同时,蔡元培还提倡“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目标,这些办学理念不仅促进了北京大学的兴盛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和基本准则,对后世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期的许多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也都谈及大学的理念问题,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提出了大学应培养专才还是通才的论题。复旦大学潘光旦先生的提出“士人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提出了“四育并举论”,这些代表性理念都蕴含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勇于创新的思想基因,初步形成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基本内涵。自此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拥有了崭新的起点,迸发出新的活力,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高等学府,涌现了许多一批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筚路蓝缕、写满辉煌的黄金时代。



二、“文化场”与行为博弈——现代高等教育办学理念の汇通与融合

(一)育人——制器,一道困惑百年的选择题

大学何为?长久以来,教育界一直陷于“育人”抑或“制器”之间摇摆,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⑥。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有待厘清的一个大问题。当代学者杨叔子也曾指出,“大学首先的根本是育人,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大学教育只有聚焦在人身上,才能真正发挥功能。”^⑦所以,大学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充分利用知识和人才的集聚优势,传授知识、锤炼心智、提升素养,使学生既能够有一技之长,又融有健康心智,最终实现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培养目标。

(二)传承——创新,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灯

美国学者亚丹(D.O.Adams)说:“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⑧。亚丹的论述准确地指出了高等学校对于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使命。大学的价值不仅对个体人格的培养、自由精神的养成举足轻重,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文明的传承也至关重要。我国拥有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通过大学这一文化机构和传承载体,将华夏文明记忆和精神载荷于历史长河之中,迁移在历代士人的家国情怀中至今仍旧熠熠生辉;西方文明的沿承也是通过大学这一载体得到继承和弘扬。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因此,高等学校应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认真汲取西方文明精华,创新时代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真正成为区域内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文化高地。

三、沿承与突破——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的实施策略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区域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身

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场,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功能的同时,还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对区域内的文化建设起引领和幅射作用。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

(一)完善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的制度体系,建设体现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制度文化

制度建设是高等教育的办学基础,是推进高职院校办学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有力保障。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建设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制度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重点应完善办学层面的顶层设计,做好学校章程建设。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和履行大学职能的基本准则,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科学发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大学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古今中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历程证明,完备的学校章程和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体系是赢得社会公众认同的基本标准。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也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书院都基本上是采用院规的形式来规范办学形式,如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的办学就注重制度规范,“制为学规,课试讲肄,莫不有法”。清末民初,京师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也都建有学校章程。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学校章程的建设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对各高校的学校章程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学章程建设迈上了快车道。我国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很多是从中等职业学校“升格”或“转制”而来,缺乏完善的制度文化,学校章程建设大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校章程建设就迫在眉睫。学校章程建设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方向性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摄下的子项目,高等学校的章程建设必须体现鲜明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重点体现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精神,从而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二是法制性原则,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依法治校,章程建设必须以党

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意见规定为准绳,主要依据《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领域已有的法律制度;三是创新性原则,主要是指章程建设应该根据各高校实际在具体建设内容上明确办学定位,展现办学特色,通过章程建设激发教职工进行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此外,高校的章程建设,还应该注重与构建高效的现代治理体系、学术科研体系相衔接,最终实现建设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体系的目标。

(二)传承和创新文化精神,打造体现区域特色的文化传播中心

大学是文化的高地和人才的集聚地,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是大学的核心功能之一。各高等职业院校应从继承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突显和宣扬区域特色文化、创新和凝练校园文化三维层面上,通过优化通识课程设计、创新宣传载体、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措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熟悉和了解地方文化特色,从文化精髓中汲取营养,培养报效祖国、热爱家乡、呵护集体的世界观、价值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介,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流价值真正融入学生血脉,成为引领人生航向的精神灯塔。在传承文化的同时,还应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赋予崭新的社会内涵和时代价值,使学生始终与时代精神同行。

(三)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营造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浓厚氛围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价值观、执行文化与文化积淀,是企业发展到一定层面后的企业品牌和价值理念。企业文化也是生产力,一个优秀的企业往往能够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在所有教育层次中,职业教育与企业、经济发展的联系最为紧密,校企结合、工学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深化校企双方的文化融合,最终形成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实现以文化人。一方面要注重凝练企业文化特质,让企业文化进校园。我国企业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契约意识、岗位意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团体意识五个意识

以及在企业内部结构所形成的内部文化结构链,高等职业院校在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借鉴企业文化中的这些核心特质融会贯通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够在校园中了解这些要求,进而转化为职业素养,实现大学教育与企业文化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应创新载体,打造企业文化进校园的有效平台。文化育人的过程是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形成的,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利用国家推进校企深度融合的有利政策,积极打造融合企业文化的平台,如在校园内建设“校中厂”,让学生在车间内完成技能培养和素质养成,定期举办企业家讲坛,邀请企业人员进课堂开设讲座,举行技能和创业大赛,锤炼学生的竞争和创新意识。通过上述措施,在大学文化的基本氛围中,让产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职业精神进头脑,从而构成高等职业教育独特的文化品格,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为学生从“准职业人”向“职业人”转变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肯定不是一所好大学,而能够代表一所高校办学灵魂和理念的是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大学精神。我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要实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进行改革,其改革的起点应是理念的改革,通过树立独特的文化建设,才能摆脱同质化的发展趋同模式,才会拥有更大的、更为长远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②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2,71页。

③胡渭:《大学翼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④李成智:《大学理念的演变和思考》,载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0页。

⑤[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⑦杨叔子:《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载于《财经》,2010年3月17日,第6版。

⑧罗岗:《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载于《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7期,第129页。